

李何林全集

第3卷

第3卷

李何林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已出版各种版本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78 年 10 月出访瑞典,与哥德
兰岛文物研究所所长在一起参观



1981 年 7 月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内鲁迅故居

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一)

鲁迅先生

1881~1936



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二)

宋阳（瞿秋白）先生

1899~1935



1982 年版重版说明

这是我 1939 年编写的一本书，到现在恰恰四十年了。我那时是三十五周岁多，今年已满七十五周岁，正向七十六岁迈进。陕西人民出版社愿重印这本书，向国内外读者提供一些这二十年间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资料，我是同意的，因为在我也可作为一种纪念。

去年 10 月，我因“鲁迅展览”去瑞典，到过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语系，有几位研究生拿出从香港买来的新印的这本书；可见在国外还需要，里面所保存的资料还有用，但在国内是早已买不到了。

严格点讲，这不能算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因为没有总结出它的“史”的发展脉络或规律，我只稍稍提到每次斗争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原因，以原始资料为主。因此，只能叫做文艺思想斗争史资料“长编”，不是“史”。所以就仿照《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这书名，名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我在“论述”这二十年间文艺思想潮流的状况，以潮流的本身表现为主。

我在什么情况下和为什么有兴趣编写这本书的呢？1937 年 8 月我从刚沦陷的北平逃出，一年后辗转流亡到了四川。一时找不到教学工作，我就利用路经武汉、重庆等地搜购到的有关资料编写起这本书来了。更远的原因，则由于五四时代当我还在师范学校

读书时,就对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言白话和新旧文学之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感兴趣;以后又注意过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编印过一本《中国文艺论战》(仿《苏俄文艺论战》书名)。对30年代的几次文艺界的斗争,我也随时留心过,有自己的看法;但因教学忙碌,又每一年或至多两年换一个地方,到处为生活奔波,未能写出自己的意见。1938年9月,我妻王振华经她北京师大的四川同学介绍,到隆昌县立中学教语文,我随往,又无工作,遂开始编写这本书。1939年1月我们迁居江津县白沙镇,和未名社的曹靖华、台静农同住一处,继续编写,全力以赴,到7月份全书完成,共约三十万字,总共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在当时为本书写的《序》的末尾说:

编者僻处小镇,参考书籍甚感困难;取材不周,论述未免失当。尚乞读者原谅并赐指正,为幸!

这倒不是照例的谦虚:“取材不周”,固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避免的缺点;“论述未免失当”,则完全由于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尤其未能和中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来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我在青年时期虽然参加过反帝爱国运动,也反封建,参加过北伐军和八一南昌起义,但直到编写这本书的当时,并没有明确中国的革命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30年前后,中国文化界不是还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进行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吗?1939年我编完这本书时,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发表;30年代国统区的文化界还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运动,看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因此,我在本书中认为“五四”新文

化(包括新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化,它的经济基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软弱的资本主义。而看不见五四运动后一个多月(“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就显示了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越来越多了;这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在全国解放初期的1950年5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批评了本书的这个主要缺点,现仍附印在这里。三十年前的自评,自然是很不够的,然亦可见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的低下。

用现在思想理论界的水平看,“论述未免失当”的地方自然还多,但现在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者,是不难看出的,这里就不一一去说明了。好在重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提供一些现在不易找到的资料;至于“论述”部分不过表现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足轻重的,只供参考。

任何文学史,或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史的编著者,表现在他的“论述”部分中都有倾向性,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只要看过一遍就会知道的。所谓倾向性,就是倾向于赞成一方的思想,反对另一方的思想;而在引用双方的文章时又似乎很客观,但“论述”起来就表现出并不客观了。世界上有真正客观的文学史、思想斗争史吗?因此,这本书得罪了我所反对的具有某一方思想的人们,我还曾经得到过报复,也算是像现在有人说的“报应”吧?没什么了不起!倾向性如果不符合实际,无理无据,那是应该被淘汰的。

这本书的倾向性,首先表现在前面的两幅铜版像:鲁迅和瞿秋白的像,而且标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这是当时一切反动派所不允许的。对瞿秋白,我标明的是他的笔名“宋阳”,因他刚被杀害不过三四年,在反动派统治的四川怎么能允许称赞他呢?(对鲁迅的通缉令也始终未取消)但我在《序》里又指出“本书中的‘何凝’、‘易嘉’、‘宋阳’、‘史铁儿’,闻都是他的笔名”。读者

一看《序》就知道宋阳是瞿秋白。

鲁迅的相片是不难找到的,瞿秋白的则简直无处可寻。我没有看见过任何公开的书报刊物上刊登过他的相片,怎么办呢?为着纪念他,能找到才好。当时曹靖华同志常去重庆见周总理,我们就请他托邓颖超同志向在延安的杨之华同志说明了用途,不久她就把珍藏多年的这一张遗照带到了重庆,由靖华转交给我。1953年编印的四卷本《瞿秋白文集》共收了他的大小相片八幅,就缺少这一张,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多么难得啊!到现在我们还应该谢谢她,可惜她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

除铜版像外,我在《序》的最后两段又用我当时的思想水平所能提出的最高赞词歌颂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界的地位和贡献,也是当时一切反动派所不允许的。自然因为这是一本讲文艺思想斗争的书,我只能从文艺思想方面歌颂他们;没有而且不可能从政治和革命方面来给予评价,像毛主席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对于鲁迅,我还引了一句当时传说是毛主席在延安说的话:“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传说自然是不一定可靠的,但在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1939年冬~1940年春)的前夕,在法西斯统治的四川,我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用了“有人说”三个字。

书编完了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业已开始的西南大后方,能找得到出版的地方吗?当时想到的只有邹韬奋先生领导的生活书店,他当时也恰在重庆。于是就请曹靖华同志介绍给他,他很快就接受了,但听说他把稿件弄到上海去印了第一版:印刷、纸张、装订和铜版像都相当好。以后我又见过大后方印的淡黄色的土纸本,未能印铜版像。不过不久就被反动派禁止了,这在全国解放后张静庐编印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206页《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目录》中列有这本书。1949年春我从华北解放区到北平(北京),不久就在王

府井大街的三联书店买到一本东北解放后重印的白色的土纸本；在刚解放的困难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印铜版像，但在目录的第一行仍有“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鲁迅先生和宋阳先生（相片）”，以保留原来的样子。

这次重印，除了改正极少数的错字和词语以外，基本上未动；所引论争双方的原文更未增未减，保持原状。我的“论述”部分，也一仍其旧，虽然我对有些问题现在已有不同的看法，那要等我将来有可能重写这本书时再说了；如果我的眼内“白内障”能够治好的话。

本书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篇名、书名号、引号等均须变动；全部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更是一大工程。我因“老年性白内障”，视觉模糊，承王德厚、颜雄以及陕西出版社校对组同志，分别担任三十万字的三次校改工作，盛夏溽暑，用力甚勤，特此致谢！

李何林

1979年8月于北京

序

中国的新文学思想,自1917年一、二月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发生,共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当然它的萌芽还早)。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期间,一方面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使中国的文艺思想,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欧洲各国从18世纪以来所有的各文艺思想流派的内容,即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颓废派、唯美派、象征派、表现派……以及新写实主义(亦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动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但是,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发展了的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了“二十年”来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或“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和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的消灭。

同时,也因为近二十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会的急遽发展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文艺思想,不能完全重复欧洲二三百年来的文艺思潮的过程;而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尽它的历史的任务。所以《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底内容大纲,就不会像是《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底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世纪末文艺思潮及新写实主义等等节目的顺序排列,而

有它自己的形态。

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大变化,有三个划时代的日子作为界标,就是“五四”、“五卅”和“九一八”(至于“七七”或“八一三”则是这二十年范围以外的划时代的日子)。这三个划时代的日子,把1919~1937年差不多二十年期间划分了三大段落,而每一段落都差不多平均占有六七年的时间:

由1919年的“五四”,到1925年的“五卅”,差不多是六七年。

由1925年的“五卅”,到1931年的“九一八”,差不多是六七年。

由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八一三”,差不多是六七年。

这样整齐相同的年数,当然是历史的偶合,然而这几个划时代的日子或事件的产生,倒并不是出于意外的毫无原因的历史的偶然,是都有它一定的社会背景的。

近二十年的文艺思想,也随着这三大段落不同的社会背景,表现着显著的转变或差异;所以本书的内容划分也就依着这三大段落而分为三编:

第一编——“‘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由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对立及“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止(即“五卅”发生前)。

第二编——“‘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学问题”:由1926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提倡文学革命起(但革命文学思想萌芽于“五卅”前一二年),中经1928年对此问题的论争,到1930和1931年进步的文艺理论及文学团体的建立止(即“九一八”发生前)。

第三编——“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艺思潮”:由1932年文艺创作自由论辩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提出讨论起,中经1934年的语文改革运动,到1936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

众文学”的论争及鲁迅逝世前后的文艺界的团结止(即“八一三”发生前)。

每编开始均有“绪论”一章,略述该段落文艺思潮的社会背景。其次第一章都是“概论”,乃该段落文艺思潮的编写或简史,即:

第一编 第一章 概论——从1917年到“五卅”的中国文艺思想界

第二编 第一章 概论——从“五卅”前后到“九一八”的中国文艺思想界

第三编 第一章 概论——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中国文艺思想界

这三章“概论”可以说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略史”;不过它们着重在文艺思想变迁的“经过”或“略述”,至于较详细的理论内容则在各该编其他各章内阐述。而各“概论”的内容取材,虽间有与各该编内其他各章相同之处,不过不多。

然而,如以这二十年文艺思想发展的“阶级性”来讲,实在只有二种思想作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这二十年的文艺界。即由1917~1927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较多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1928~1937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每一时代又恰恰平均占有十年的时间。兹分别述其梗概如下:

前十年可以分为初、中、末三期:

初期(1917~1920年),即“五四”前后的各一二年,是反封建文学的斗争时期,奠定了资产者的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基础。

中期(1921~1924年),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对立时期。这时资产者社会的文艺思想或创作方法论: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取着对立的形势而同时存在,反映了欧洲18和19世纪的资产阶文学的意识形态。

末期(1924~1927年),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渐渐转变,由“唯美”、“为艺术”而“为人生”、“为社会”、“为革命”、“为无产阶

级”。这转变开始于“五卅”的前一二年(即1923和1924年,也就是革命文学思想萌芽的时候)。“五卅”后一年才正式提出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到1927年以后这问题才引起了一次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运动,但那已属于后十年了。

后十年也可以分成初、中、末三期:

初期(1928~1931年),由1928年“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论争,使文艺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起,至1930年“左联”的成立,及由此到1931年“九一八”发生前反动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想的昙花一现止。

中期(1932~1934年),为“左联”领导着文艺思想界,向实际上求解决求发展的时期。如1932年的文艺自由论辩和大众文艺问题的讨论,1934年语文论战时的反封建文言文的复古运动,反欧化的白话文的论争,“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运动。

末期(1935~1937年),为左翼文艺思想作为主要的势力支配着“新文学”的领域,反对派(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的文艺思想虽尚有其社会的影响与势力,但他们的理论已不足与左翼对敌。这时左翼方面(并非仅只“左联”)为着文艺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的口号问题,遂自行论争起来;就是1936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因为双方的文艺思想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不过为着“宗派主义”从中作祟,才做了这一次的“口号之争”(但这次论争并未浪费);所以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发表,也就阴霾消散,告一结束。在鲁迅逝世前,有感于国难日急,新旧各派作家已有团结御侮的表示了。

本书为着显示文艺思想与其时代社会转变的密切关联,故以“五四”、“五卅”、“九一八”为分期的界标,未采用上述的阶级性的分法;不过论述的观点则仍然一样。

此外,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林琴

南、梅光迪、胡先骕、章士钊等为“古典文学”的维护者；“创造社”诸人为“浪漫主义”作家；“文学研究会”则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郁达夫的一部分小说和徐志摩的后期诗作是“颓废派”、“唯美派”的作品；李金发、戴望舒等神秘的诗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作；那么，“五卅”以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到1930年“左联”的成立及其以后，也就可以说是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时代了。本书的内容若依此编排论述，岂非较合于“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的发展顺序，且较为世界化？

无奈中国“五四”的“文艺复兴”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但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只不过在思想界的情形上，两者稍有相似之处而已。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要打破者是冷酷黑暗的宗教思想；在我们五四时代，所要打破者是差不多等于那样冷酷黑暗的旧礼教观念。这是相似的。但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社会的基础是渐具势力的手工业和小商业，反之，作为“五四”之社会的基础是近代的机器工业和银行资本了。这是两者很不相似的。同时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后，并无欧洲似的“古典主义”的时代，林、梅、胡、章诸人算不得“古典主义”文学的人物，他们不过是二千年来封建文学的送丧者而已。而且，动摇妥协和前途暗淡的中国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产生绚烂的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像露俄一派），发育得不完全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会产生壮健的资产阶级文学，是自然不过的事。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很少发扬蹈厉的新兴阶级的气概，很少乐观，多是苦闷，彷徨和颓废。况中国的“浪漫”、“自然写实”、“颓废”、“唯美”、“象征”等等，又差不多同时纷然杂陈，不似在欧洲的时序较有先后，反映着各自时代社会的特质（中国的这些派别，当然也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兼之上述第二段的理由，故本书的编制成为现在的形态。

我们略观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发展，也反映了二十

年来中国社会各时期的特质。文艺思想固时时受着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文化的影响,而文艺的浪潮也在激荡着、推动着或影响着政治社会和其他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做了很好的工作,占着很光荣的一页。但是文艺的思想浪潮,在大的方面固然时时向前不停的奔流,而小的方面也常常不免有逆流、有回旋;兼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每一种文艺思想问题已经论争过一番,解决过一次了,往往不免以后又要重说一遍,以致许多的精力浪费在反复申述的理由上。如1934年汪懋祖等重新提出的文言白话优劣的论争,和近些年文化方面的复古倾向(这固然都有它的社会基础),就都是五四时代所已经解决的。有许多话,过去的复古运动者都已经说得那么透彻,那么明白过;倘能查查旧案,也免得重说一遍或把中国社会向后拉。又如1932年的“文艺创作自由问题”,在1928年革命文学问题论争时,本已讨论到了,就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虽然没有像在1932年作为专题的详细地阐发,并得到更深入更进步的论究,然而有许多话也是重说了的。本书现在把这二十年来在中国文艺思想界所有已经论争过的主要问题,加以论述;除编者依个人见解所下的论评外,为着上述的缘故,就多多引用原文:一以保存各时期作者的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以免复述失真;一以供人们查查旧案,有免得多说一遍的用处。

有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因此,本书引“经”甚多,以见我们的“新中国的圣人”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潮中,怎样尽他的“领港”和“舵工”的职务;并供研究鲁迅者关于这一方面的参考。

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界中,除鲁迅以外,瞿秋白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他所作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赤都心史》虽然未曾广泛的与读者相见;但他译述的《海上述林》则早给中国文艺思想

界以很大的影响(此书由鲁迅集印,于1936年出版,但里面各篇文章的发表则为期较早)。此外,他的论文集《乱弹》闻已在上海出版了。本书中的“何凝”、“易嘉”、“宋阳”、“史铁儿”闻都是他的笔名,我们从这些笔名的文章中,可以看见他的风格底清新、俊逸、漂亮、通俗、深刻、锐利而且有力!这当然不仅仅由于他的文字的形式,而是由于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知识,而是由于他的政治社会文化斗争的实践。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占着同等的地位。他的文章风格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璧”!假使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么,他可以算是中国的蒲列汉诺夫了(但他还批判了弗里契和蒲列汉诺夫诸人的错误或缺点;这里是比拟他在中国新兴文艺理论建设上的地位)。可惜,他不幸早于1935年去世(当时他仅三十五岁上下),不能为中国文艺界译著更多的宝贵的东西;这损失,和1936年之损失了鲁迅是一样的重大。

编者僻处小镇,参考书籍甚感困难;取材不周,论述未免失当。尚乞读者原谅并赐指正,为幸!

1939年7月李何林于四川江津白沙镇